

Signatura Rerum

Giorgio Agamben

06

eft

主编 吴冠军 蓝江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6

万物的签名

论方法

吉奥乔·阿甘本·著 尉光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Signatura Rerum

Giorgio Agamben



主编 吴冠军 蓝江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6

万物的签名

论方法

[意]吉奥乔·阿甘本-著 尉光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Signatura Rerum

by Giorgio Agamben

Copyright © 2008 by Giorgio Agambe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Bollati Boringhieri editore, Torin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物的签名：论方法 / (意) 吉奥乔·阿甘本著；

尉光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17-3120-3

I. ①万… II. ①吉… ②慰… III. ①逻辑方法

IV. ①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5919 号

万物的签名：论方法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贾宇琰 朱瑞雪

特约编辑：杨晓琼 田 奥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120 千字

印 张：6.25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总序

吴冠军、蓝江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我们经过漫长筹备的一套丛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在汉语学界，“左翼（派）”这个说法长久以来陷于深度混淆：我们触目可见诸种“老左派”“新左派”“极左思潮”标签，但归在这些标签下的种种论述真的可以代表“左翼”吗？

什么是“左翼”？在我们看来，“左翼”有两个定义性的特征。一是态度性的，即对当下既有现状（status quo）持一个批判性的态度。这个“态度”（attitude），亦即福柯所说的“启蒙的态度”：“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的一个永恒的批判。”以此态度观之，今天汉语学界的许多“左翼”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与此同时，“左翼”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特征：它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诉求”。这个实质性内核，就是争取更充分的平等。“左翼”的政治思想或话语，无论再如何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多元性，其最根本层面上的底色不会更改——追求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

(egalitarian society)。这就是“左翼”的两个定义性特征：批判性的态度与平等性的诉求。通过策划这套丛书，我们旨在在汉语学界重新厘清“左翼”思想的根本轮廓，并带领读者进入到左翼思想的最前沿地带。

以此为旨归，这套丛书将系统性地向汉语学界引入关于当代左翼思想的最前沿成果。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欧陆思想界的政治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状况与新的气象：在政治上，90 年代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而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将西方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标识了“哲学的终结”。而恰恰是在这个双重“终结”的状况下，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开始走到国际学术舞台之一线前台，其中具超凡影响力的就有齐泽克、巴迪欧、奈格里（及其合作者哈特）、阿甘本、拉克劳（及其合作者穆芙）、朗西埃、巴里巴、瓦蒂莫等等。这些思想家在过去近二十年间的著述，已然开辟出了欧陆思想的全新气象，打开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诸种）新的开端。

二

如何在欧陆思想史脉络中定位这批新一代欧陆左翼领军人物？

让我们先回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前面已提到，当时，一股后来被概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运动，将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向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为什么这样说？

古希腊的古典形而上学以“理性”（logos）应治多神时代的“神话”（mythos），以“自然”（physis）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石。随后基督教神学以“上帝”代替“自然”，作为人的世界最终的根基与根据。欧陆思想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启蒙，则瓦解“上帝”的权威，重新以人的理性作为共同体之维系力量。继之而起的三轮思

想浪潮——历史主义、存在主义、阐释学——完成了从启蒙的普遍主义到后启蒙之视角主义（时代精神、个体意志、视域）的转换。随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则借助语言学与精神分析而彻底瓦解“主体”之范畴（“主体”被构理论）。最后，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这里，“历史化”与“结构化”相结合，“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无基础主义”“新实用主义”，皆指向了欧陆思想自身的逻辑终点——不再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力量或范畴，可以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支撑。对欧陆思想史深有洞见的利奥·施特劳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做出如下宣布：除了“回归”——回归古典形而上学或神学（“雅典或耶路撒冷”）——外，别无新的思想突破口。¹

然而，我们已经能在晚近二十年欧陆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捕捉到一股新的思想脉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齐泽克与阿甘本这两位出生于 40 年代的思想家，与比他们略长半辈的奈格里、拉克劳、巴迪欧等人（皆出生于 30 年代）一起，围绕“the Political”（政治）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欧陆思想之前沿地带——一个新兴的“激进左翼”思想阵营。

但我们仍然面对的重要问题是：是什么使得这股“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在过去十几年内迅猛崛起？这些学者同前代左翼学者（后结构主义者）的根本学理分歧在哪里？他们是否真正打开了全新的思想格局？

三

在我们看来：这一代欧陆思想家的崛起，始于他们不满于后结

¹ 进一步阐述请参见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第 3—152 页。

构主义者在“政治主体”问题上的立场——即“消解主体”后，拥抱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intimate revolt）、拟像游戏、小叙事与歧见的繁荣、多元主义的族群认同，等等。在这些当代激进思想家看来，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今天已经彻底丧失反抗性，因为它们已经被整合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拟像游戏、小叙事繁荣、小共同体认同、开放的多元主义宽容等等，都能在被齐泽克称作“后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中得到实现。而后结构主义的当代传人，如赛蒙·克里奇利、朱迪丝·巴特勒等人，皆发出如下论调：现状永远会持续下去，我们无法击败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我们只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私密的反抗”，进而，努力让各种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声音被听到……这种左翼姿态，在当代激进左翼学者眼中，正是把左翼事业引向一条绝路：从哈贝马斯到克里斯蒂娃，顶级左翼思想家们明里暗里皆纷纷放弃社会变革的目标（承认资本主义秩序会不断持续下去）、放弃激进解放的理想（玩玩“私密的反抗”、搞搞小范围的游戏）……

是故，把理论进路并不一致的这批当代学者们联合成一个“激进左翼”思想阵营的，正是他们所分享的这样一种立场：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反抗。而在学理上，不论他们的正面主张为何，这批左翼学者旨在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的主体问题：传统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之后，什么能成为新的变革既有秩序的主体？

今天“激进左翼”阵营中的成名人物，都在政治主体这个问题上深有建树。若对他们进行细致的理论梳理的话，则可分出四个理论路向。有意思的是，前三个路向正好两两出场：第一对，就是因写作《帝国》三部曲而大名鼎鼎的哈特和奈格里；第二对，是在80年代就已成名的拉克劳和穆芙（他们的成名作《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是左翼政治哲学的地震式作品）；第三对，就是齐泽克和巴迪欧（他们也有一本合著，即收入本丛书的《当下的哲学》）。而第四个路向，则是以阿甘本的《神圣人》（亦收入本丛书）三部曲为代

表。这四个路向，实则构成了当代欧陆左翼思想之基本框架。

进一步沿着思想史的线索向上追索，我们就能看到以上四个路向各自背后的理论资源：第一对背后站着的是马克思和德勒兹，第二对背后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第三对背后是马克思和拉康，第四个背后则是海德格尔与本雅明。进而我们想指出的是，这批激进左翼思想家给我们打开的思想视野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他们更是向上追到了古典德国理念主义（齐泽克），追到了斯宾诺莎（奈格里），追到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阿甘本），追到了柏拉图（巴迪欧）。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把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去放在一个更大的思想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对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巴迪欧、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麦金泰尔/阿甘本、霍布斯到施米特/阿甘本、斯宾诺莎到德勒兹/奈格里、康德到海德格尔/罗尔斯/拉克劳、黑格尔到科耶夫/泰勒/齐泽克等等这些充满“歧路”的思想史线索，去做出一个学理上的内在衡析。¹

四

汉语学界对当代左翼前沿思想的研究，从21世纪初大陆和台湾开始陆续翻译他们的著述以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少在今天，齐泽克、奈格里、阿甘本、巴迪欧等名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已经不再是陌生语词。

然而，其中很多著作之翻译质量，实是不如人意。究其缘由，我们认为问题出在汉语学界的研究者与翻译者们对当代左翼思想尚无系统了解与学术认知。因缺乏实质性的学术储备，很多译者是在

1 以上分析的具体展开，请参见吴冠军：《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9页。

为翻译而翻译，乃至在粗劣的“硬译”。这便使得左翼思想在学界面目更加晦暗不清，遑论对之进行学理上的深入梳理与衡析。正是有鉴于这一局面，在三辉图书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便投身筹划这套大型丛书。

本译丛就其规模而言，目前包含两大板块部分：第一部分，我们选取了当代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包括阿甘本、齐泽克、巴迪欧等人（还有一些他们老师辈的，比如加塔利）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希望通过翻译的方式——尽力做到优质的翻译——呈现出当代欧陆左翼的思想地貌。第二部分，我们则选取分析欧陆左翼思想跟中国思想互动的研究，包括借助左翼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思想的著作。以展现左翼思想与中国语境的诸种相关性。

认真负责的学术翻译，在今天诚然是“高投入、低产出、低报酬、高风险”的高压且高危行业，于职业于健康皆无“益处”，只有“愚公”才会干。很感谢和我们一起投入这项事业的愚公学友们。我们谨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微薄努力，为汉语学界的左翼思想研究与学术讨论带来一些不同的景观。若能至此，纵疲累，心愿已足。

导读

当下考古与时间魅像¹ ——跟随阿甘本重思福柯的考古学方法

姜宇辉

《万物的签名》(下简称 SA)这本文集的副标题是“论方法”(On Method),确实别有意味。这自然首先会令人念及笛卡儿的那篇著名的同名论文(*Discours de la méthode*)。但与笛卡儿的情形有所不同,阿甘本对方法的反思并非先于其哲学体系的建立,而恰恰是在漫长的探索历程之后所进行的重新梳理和澄清。SA初版于2008年,此时“神圣人”系列已经出版了第四本《王国与荣耀》(2007年),而阿甘本亦已凭借这个令其声名鹊起的系列牢固确立起在国际思想界的地位。或许这正是对自己的研究方法

1 本文仅是对于《哲学考古学》一篇的集中诠释。对于文集外的其他两篇,笔者已经在别处进行过阐释:参见《当代法国思想脉络中的蓬热诗学》(《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作为“范式”的透视法》(即将发表于“当代艺术研究:哲学与社会学的维度”会议论文集)。

进行深刻反思的恰当时机，在之前的著作中或明或暗地潜藏着的思想脉络亦逐渐浮现出清晰轮廓。就此而言，他与福柯的情形是更为类似的。就“考古学”而言，虽然此种主导的方法很早就有福柯的研究中萌发（最早可回溯至 *Introduction à l'Anthropologie de Kant*），他自己更是明确地将 60 年代的三部早期代表作皆冠以考古学之名〔《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目光考古学》（*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但直到《知识考古学》，“他才要求自己之前‘盲目’运用的方法进行明确的表述和奠基”¹。甚至有学者将其比作福柯的“discourse on method”²，似乎亦不为过。

看似阿甘本在 SA 中所进行的也是类似于《知识考古学》式的回溯式反思，但仔细考量阿甘本和福柯的思想发展轨迹，却会发现一个极为明显的差异。至少就 *Homo Sacer* 系列的前四本而言，无论就主题、风格还是遵循的基本方法而言，都显然更鲜明地体现出“谱系学”的特征。³但在 SA 之后出版的同一系列的后续作品之中，他却明确地回归“考古学”的路线：比如，与 SA 同年出版的第五本就命名为“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进而，在 2012 年出版的《主业：义务的考古学》中，我们看到这一路线仍在持续

1 Béatrice Han,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translated by Edward Pi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0.

2 转引自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p. 212, note 67.

3 《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年，“后记”，第 165 页。

推进、深化。表面看来，阿甘本明显撷取了一条与福柯正相逆反的思索道路。如果说在福柯那里，从考古学向谱系学的转变标志其思想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在阿甘本这里，从谱系学回归考古学反倒成为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趋势。当然，单纯的逆转和颠倒无法真正确立一种方法的合理性。更为棘手的难题在于，虽然诸多学者都颇有根据地强调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内在连续性，但福柯之所以随后转向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无疑亦是因为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考古学有着内在无法克服的困境。如此看来，阿甘本必须提出极为有力的论据为自己的选择做出辩护。这也是引发我们在这里细读《哲学考古学》这一篇章的初始动机。

1. “考古学方法的失败”(The Methodological Failure of Archaeology)? —— 考古学与谱系学之辨

在《福柯词语汇释》(*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的“考古学”词条中，朱迪特·勒薇尔(Judith Revel)极为清晰地界定了这一基本方法的三个要点：一是“l'arché”-“commencement”(“源”——“始”)，就考古学而言，主要指种种不同的话语类型的诞生过程；二是“l'archive”(“档案”——“记录”)，即对这些诞生过程所进行的描述；三则是“当下”的时间指向(“l'archéologie

visé en réalité le présent”¹)。然而,随后勒薇尔对考古学向谱系学的转向的内在契机的阐释却显得令人费解。她将考古学归于“水平”(horizontale)的维度,与之相对,谱系学关注的则是“垂直的”(verticale)深度。但这种看似流行的见解实际上起到的却是误导的作用。

首先,单从水平和深度的对照来说,无从从根本上区分这两种基本的方法。考古学虽然意在描述话语形成、转化、演变的结构和规则,但与结构主义范式不同的是,它更为关注偶发性的创生事件²、可能性的开敞维度,以及边界处的模糊状态,所有这些都明显体现出与谱系学之间的密切联系。简言之,考古学已然体现出了一种“深度”³。这也是为何阿甘本在第一节回溯了“哲学考古学”这一方法在康德那里的最早发端之后,随即在第二节中结合《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这一名文阐释了 *arché* 和所谓“实际的起源”(factual origin)之间的本质性区分。看似这一从考古学向谱系学的骤然跳跃显得突兀,但实际上阿甘本在这里无非是明示一个根本要点:至少就 *arché*

1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ellipses, 2002, p. 7.

2 “同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failles)、缺口(béances)、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版,第188页。同时参考法文版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Gallimard, 1969。以下仅标注中文页码。)

3 “考古学不仅不认为话语只是由一系列同质的事件(个体的表述)构成的,而是在话语的深度(l’épaisseur)本身中辨别许多可能的事件层”(《知识考古学》,第190页)。

这一“源—始”维度而言，考古学和谱系学是完全相通甚至彼此莫辨的。二者所探寻、“挖掘”的既非是事实性的“发端”或“起点”（origin），亦并不关注历史性的演变过程（l'évolution）。借用尼采的那个术语，它们共同关注的正是 *Enstehung*，也即“出现——事物涌现出来的那一刻”（emergence, the moment of uprising）¹。与 *Ursprung*（origin）不同，*Enstehung* 不关注事实性，而更关注可能性；同样，与历史学家的研究不同，*Enstehung* 不关注传统和过去，而更为关注当下。就此而言，其实 *Enstehung* 可以极为恰当地界定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共通的时间性向度。可以说，这个当下的“构成性的异质性”（constitutive heterogeneity），正是二者所共同指向的“深度”。

阿甘本以 *Enstehung* 为焦点来汇通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做法还具有另一重功效，即防止我们以过于简单的图式来理解谱系学的所谓“深度”。由此德赖弗斯与拉比诺（Dreyfus&Rabinow，下简称 D&R）甚至明确强调，其实“谱系学避免探索深度。相反，它探寻散布着事件、微小细节、微观变化及精细轮廓的表层（surface）”²。在《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这另一篇经典名作之中，我们甚至读到福柯将谱系学的操作解释为将“深度”摊开于可见

1 SA 第 2 节。本文中 SA 的引文皆取自中译本，同时参考英译本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translated by Luca D'Isanto&Kevin Attell, New York: Zone Books, 2009。下同。

2 Hubert L. Dreyfus &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983, p. 106.

性的平面上的做法。¹从这个方面看，谱系学又明显类同于考古学。这就令我们可以颇有理由地将谱系学的方法甚至一直回溯至考古学所主导的福柯思想的早期阶段。也难怪勒薇尔在“谱系学”词条的最后甚至总结道：“谱系学使我们得以对福柯的研究工作——自最早的文本（在那里甚至谱系学的概念还尚未得以运用）直至晚期的作品——形成一个连贯性的理解。”²可见，单纯水平/垂直、表面/深度的二元性视角根本无法揭示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本质差异，反倒阻碍了我们深入洞察二者之间本已经存在的内在联系。

不过，阿甘本在第二节中的阐释虽然充满启示，但一开始就基于考古学和谱系学之相通展开论述，多少亦会令读者陷入一种本可避免的迷误之中。我们清楚看到，阿甘本在后文之所以可以完全不谈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关键差异，甚至仅仅围绕 *Enstehung* 这一条主线贯穿起通篇论证，这至少证明：在他看来，二者在 *arché* 这一要点上的根本相通完全优先于种种细节上的差异。但是否果然如此？他可以忽视 D&R 和贝亚特丽斯·韩（*Béatrice Han*）等人就“考古学方法的失败”所进行的种种详实论证，亦可以对理应进一步展开的康德哲学的背景放置不理，但他仅仅关注考古学方法的两个要点（“源始”与“当下”），而全然忽视 *archive* 这另一个关键点的选择，却绝对是一个明显的硬伤。或许阿甘本

1 转引自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pp. 106-107.

2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p. 38.

本可以进一步论证 archive 这个环节并不具有独立的重要性，而是理应被纳入“源始”——“当下”的时间性辩证之中。但我们接下来首先就要揭示的是，实情或许恰恰相反。

关于从考古学向谱系学的转化，学界一般通行两种解释。一是主题的转变，即重点从话语转向非话语的实践，尤其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联；二是尼采的谱系学对于福柯的看似决定性的影响。这双重原因虽然在 D&R 的著作中得到肯定性的分析，但在韩看来，它们其实皆属颇为肤浅的陈见（尤见其名作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的第三章开始部分）。首先，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其实恰恰是要克服所谓“话语 / 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因为他所说的“实践”从根本上说是贯穿话语和非话语的不同层次的运作¹。这也是为何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将话语和实践并称，进而提出“话语实践”（*pratique discursive*）这个独特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²。其次，尼采的影响也显然不是从谱系学转向开始。实际上，自福柯思想真正发端之际，尼采的影响就已然无所不在。由此福柯才会在访谈中明确肯定，“我的考古学其实更归功于尼采的谱系学

1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p. 76.

2 《知识考古学》，第 130 页。

而非结构主义”¹。

虽然韩的批判性剖析言之凿凿，但其进一步对考古学和谱系学之分的阐释却几乎毫无悬念地再度落入这双重成见之中。一方面，她指出，之所以需要从考古学转向谱系学，首先是因为前者仅仅局限于“纯粹认识论层次”(purely epistemological level)²，由此尚未能真正深入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深层勾连。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将谱系学的起点划定于《尼采、谱系学、历史》这一公认的标识，但她在另一篇重要文本[《话语的秩序》(*The Order of Discourse*)]中却同样发现了另一个导致谱系学转向的尼采式动机，即“求真意志”。第二个方面是引导其著作后半部分论述的主线，其中对“拥有真理(接受性)”[being in the truth (acceptability)]与“说出真理(断言)”[saying the truth (predication)]这一对重要范畴的对比性阐释确实极有启示。但这些阐释的重心明显偏向于谱系学的脉络，而对于我们重新理解考古学方法确实助益甚微，因此也就不必详述。

关键或许在于第一个方面。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考古学——即便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比如《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实践的分析阐释——仍然未能成功超越“纯粹认识论的层次”？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重新引入 archive 这个要点的契机。也正是在这里，

1 转引自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p. 76。

2 Ibid., p. 77。